

文化遗产旅游地社会嵌入对社区居民亲旅游行为影响研究

——基于澳门历史城区的实证考察

王忠 李来斌

摘要:从嵌入性理论视角,引入文化依恋、角色认同和获益感知三个变量,构建社会嵌入对文化遗产旅游地社区居民亲旅游行为影响的结构方程模型。以澳门历史城区为案例地,基于402份有效问卷,运用偏最小二乘法对假设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文化遗产旅游地社会嵌入对社区居民文化依恋、文化依恋对角色认同、角色认同对亲旅游行为皆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文化依恋和角色认同在社会嵌入与亲旅游行为间起到链式中介作用,获益感知在文化依恋与亲旅游行为、角色认同与亲旅游行为之间起正向调节作用。社区居民是文化遗产地旅游开发的主要参与者与受益者,应注重社区共同体的构建,营造有活力的文化环境,帮助居民从旅游发展中获益,增强居民对社区发展旅游业的信心,以实现文化遗产与旅游的深度融合与双向赋能。

关键词:文化遗产旅游;社会嵌入;文化依恋;社区参与;亲旅游行为

DOI: 10.19836/j.cnki.37-1100/c.2024.05.004

一、引言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要求“健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体制机制”^①,文化遗产旅游是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的重要实践。价值传承与共享是文化遗产旅游的本质特征^②,其作为一种现代化力量,将过去的遗产转化为美好未来的发展动力,不仅有助于文化遗产多元价值和功能的实现,也使得遗产资源融入日常生活,成为当地居民自我表达的方式,继而为其生活增添福祉^③。当前,文化遗产旅游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成为基层社区实现经济发展与中华优秀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途径^④。然而,随着文化遗产旅游的持续升温,文化遗产地的矛盾冲突日益多元。如何协调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之间的关系,有效建设高质量文化遗产旅游景区并实现遗产地的可持续发展,成为业界和学界普遍关注的问题,研究视角开始从资源利用^{⑤⑥}、发展模式^{⑦⑧}逐步转向

基金项目: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推进文化自信自强的时代背景与现实途径研究”(23ZDA081);南方科技大学全球城市文明典范研究院2023年开放课题“文化互鉴与文明创新——来自澳门的历史与经验”(IGUC23B007)。

作者简介:王忠,澳门城市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华南农业大学兼职教授,南方科技大学全球城市文明典范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澳门 99907; zwang@cityu.edu.mo);李来斌,澳门城市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澳门 99907; 1946893161@qq.com)。

①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人民日报》2024年7月22日,第1版。

② 张朝枝、杨继荣:《建构与协商:文化遗产与旅游的关系再认识》,《旅游学刊》2022年第11期。

③ 孙九霞:《文化遗产的旅游化与旅游的文化遗产化》,《民俗研究》2023年第4期。

④ 李凤亮、陈能军:《中国式文化现代化建设论纲》,《广东社会科学》2023年第3期。

⑤ 宋振春、朱冠梅:《世界文化遗产旅游深度开发研究——以曲阜为例》,《旅游学刊》2007年第5期。

⑥ 顾金孚、王显成:《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价值评价体系初探》,《资源开发与市场》2008年第9期。

⑦ 贺小荣、胡强盛、Min Jiang:《气候变化背景下文化遗产旅游发展模式的重构》,《南京社会科学》2016年第9期。

⑧ 赵博文:《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社区主导发展研究》,《社会科学家》2019年第8期。

社区参与^{①②}、价值共创^{③④}等方面。社区居民是文化遗产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最能展现地方人文特色与历史传承的群体^⑤,其对旅游业的行为态度不仅影响着游客的感知与体验,也是当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⑥。以往关于居民对文化遗产地旅游开发态度的研究主要以社会交换理论为基础,从居民对旅游效益的感知角度展开探讨,如生活质量^⑦、旅游增权^{⑧⑨}、生计影响^{⑩⑪}等。然而,居民是否支持本地旅游化发展不仅取决于旅游开发交换的资源质量,同时还受到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等社会情境因素的影响^⑫。

社会嵌入理论认为,个体经济行为与社会行为的产生,嵌入社会网络并受社会关系的影响。社会嵌入能够帮助行动者创造机会、提升能力和产生动力^⑬,为探究文化遗产地旅游开发过程中居民的行动逻辑提供了新的视角。本研究基于文旅融合背景,引入文化依恋、角色认同、获益感知三个变量,构建社会嵌入对文化遗产地社区居民亲旅游行为作用机理的研究模型,并以澳门历史城区社区居民为研究对象,以期为文化遗产地的可持续发展与居民生活质量和幸福感的提升提供有益指导。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基础

(一)居民亲旅游行为的概念界定

社区居民旅游影响感知一般指目的地居民在旅游发展情境中对自身居住空间人地关系以及环境改变的主观认知^⑭。亲旅游行为代表了目的地居民对旅游发展态度的行为维度,是亲社会行为、亲环境行为内涵和外延的延伸,有研究者将其看作旅游目的地居民支持旅游业或者愿意参与当地旅游发展的行为意向^⑮。亲旅游行为的目标通常包括提高生活质量、创造经济机会以及提升游客满意度等方面。研究表明,该行为通常受到旅游获益感知^⑯、主客互动质量^⑰等方面的影响。根据亲旅游行为

- ① 陈炜:《四川盐文化遗产旅游扶贫内生动力——基于社区参与的角度》,《社会学家》2020年第1期。
- ② 苏明丽、杨伦、何思源:《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发展与社区参与路径》,《旅游学刊》2022年第6期。
- ③ 章牧:《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化研究——基于文旅融合的视角》,《社会学家》2021年第6期。
- ④ 胡宏东、邹愿、张宇琪等:《价值共创视角下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资源融合研究》,《科技和产业》2022年第6期。
- ⑤ 李渊、王秋颖:《鼓浪屿文化遗产地社区居民的旅游感知研究》,《中国文化遗产》2017年第4期。
- ⑥ Ribeiro M. A., Pinto P., Silva J. A., et al., "Residents' Attitudes and the Adoption of Pro-tourism Behaviours: The Case of Developing Island Countries", *Tourism Management*, 2022, 61, pp. 523-537.
- ⑦ 李瑞杰、何勋:《居民旅游影响感知、态度与参与意愿研究——以世界文化遗产地为例》,《对外经贸》2021年第4期。
- ⑧ 王会战、李树民、刘洋等:《中国情境下文化遗产地社区居民旅游增权的结构与测量——基于个体感知的视角》,《预测》2015年第4期。
- ⑨ 张鲸、李强、陈戈等:《文化遗产地社区居民旅游增权感知研究——以北京八达岭镇岔道村为例》,《建设科技》2018年第5期。
- ⑩ 张爱平、侯兵、马楠:《农业文化遗产地社区居民旅游影响感知与态度——哈尼梯田的生计影响探讨》,《人文地理》2017年第1期。
- ⑪ 陈炜:《四川盐文化遗产旅游扶贫内生动力——基于社区参与的角度》,《社会学家》2020年第1期。
- ⑫ 郭安禧、王松茂、李海军等:《居民旅游影响感知对支持旅游开发影响机制研究——社区满意和社区认同的中介作用》,《旅游学刊》2020年第6期。
- ⑬ 刘冰:《旅游学科研究中的社会网络思想及其研究范式》,《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 ⑭ 王纯阳、屈海林:《村落遗产地社区居民旅游发展态度的影响因素》,《地理学报》2014年第2期。
- ⑮ 李东、于智伟、刘旭义:《旅游地企业社会责任与居民亲旅游行为——一个被调节的中介作用模型》,《地域研究与开发》2022年第3期。
- ⑯ 李东、崔春雨、马长发等:《社区关系、效益感知与亲旅游行为研究:一个有调节的中介作用模型》,《干旱区地理》2020年第4期。
- ⑰ 龙春凤、柴寿升:《情感凝聚对目的地居民亲旅游行为的影响研究——基于多重中介作用模型》,《资源开发与市场》2021年第8期。

的内涵和文化遗产旅游的特点与时代要求,可将居民亲旅游行为定义为:文化遗产地社区居民对本地旅游开发的积极关注以及致力于促进本地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有意识行为。该行为体现了居民对其所在社区未来发展的期待,表现为对本地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关切,对游客的接纳与友好态度,以及为提升游客旅游体验而投入的时间、精力、资源和行为等。

一般认为,居民的亲旅游行为属于社会公民行为,源于组织公民行为的研究。近年来,组织公民行为的概念逐渐被用于考察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支持,即社区支持,然而该领域研究常囿于经济理性驱动视角,往往忽略了当地组织环境对个体行为干预或重塑的潜力^①。居民是区域旅游发展情境下社区生活产生深刻嬗变的客体,承载着周遭政治、经济、环境的巨大变化^②。文化遗产旅游地拥有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涵盖各方面的利益相关者,因此,对当地居民亲旅游行为的影响因素还需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

(二)亲旅游行为的社会嵌入因素

“嵌入性”的概念由 Polanyi 在其著作《大转型:我们时代的经济与政治》中首次提出,认为经济行为作为一种制度过程,嵌入于经济和非经济制度之中^③。Granovetter 肯定了 Polanyi 的观点并进一步提出了社会嵌入理论,对主流经济学中的社会化不足与社会学中的过度社会化进行了批判,提出个体不能脱离社会背景独立行事,亦不完全受制于社会规则,而是嵌入于具体的、当下的社会结构和动态的社会关系中^④。Granovetter 等将社会嵌入分为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前者涉及社会关系的力度和质量,后者关注个体连接社会成员的数量以及在社交网络中的位置,二者共同影响着个体获得资源的机会^⑤。至此,社会嵌入理论形成了完整的框架,许多学者将其应用于对个体行为及集体行为的分析,同时又有许多嵌入性概念被提出,如制度嵌入、文化嵌入、认知嵌入、环境嵌入、组织嵌入、技术嵌入等。

文化遗产旅游社区是基于地缘、血缘、亲缘等社会关系的集合体,人们拥有共同的物理居住空间、社会交往空间、情感归属空间和利益表达空间,文化环境、人际关系、社交网络和制度规范等多种因素的交织,共同构筑着居民的认知和行为模式^⑥。在社会嵌入理论框架下,认知嵌入反映着文化遗产资源对居民价值观和信念体系的建构,制度嵌入涉及与当地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相关的管理规范、权力架构等政策因素,关系嵌入强调社区成员之间的社会联系与互动,结构嵌入则关注个体在社区中的社会地位和角色,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于居民的感官,进而影响着居民对本地发展旅游业的态度与行为。

(三)文化遗产地居民的情感响应

人地关系是社会地理学、文化人类学和旅游研究领域中的重要课题,涉及个体和社群在特定文化遗产背景下的情感体验和认同感^⑦。在文化遗产地旅游化发展过程中,社区居民参与为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文化遗产的知名度又可以让居民从旅游活动中获益,二者构筑了社区环境中独特的文化面貌和景观特征^⑧。研究认为,社区居民对文化遗产的价值认知是其作为主体价值建构的重要过程,对于文化遗产的价值建构包括两个层面的认同问题:一是居民自身对文化遗产的价值认

^① Zhang H., Xu H., “Impact of Destination Psychological Ownership on Residents’ ‘Place Citizenship Behavior’”, *Journal of Destination Marketing & Management*, 2019, 14, No. 100391.

^② 范莉娜:《民族旅游地居民分类及支持行为的比较研究》,《旅游学刊》2017年第7期。

^③ Polanyi K.,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Boston: Beacon Press, 1944, p. 32.

^④ Granovetter M.,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5, 91(3), pp. 481-510.

^⑤ 兰建平、苗文斌:《嵌入性理论研究综述》,《技术经济》2009年第1期。

^⑥ 谢桂华、王小榕:《城市化进程中的社区社会关系转变》,《社会学评论》2021年第3期。

^⑦ 徐彤、白长虹、陈晔等:《中国文化背景下居民地方情感对价值共创意愿的影响研究》,《旅游学刊》2021年第5期。

^⑧ 寇怀云、俞文彬:《文化景观视野的乡村遗产区域性保护——思路与模型构建》,《城市规划》2022年第11期。

同,二是文化遗产对于居民社会文化身份认同的纽带作用^①。在旅游开发情境中,居民对社区的文化表征感知、对文化遗产的积极情感会影响其旅游支持的可能性^②,同时,其遗产责任认知、对旅游开发的积极影响感知能有效激励旅游地发展中的社区参与^③。

以往关于文化遗产对社区福祉影响的研究多侧重于经济层面,如就业机会和经济增长等,往往忽视了文化遗产本身所具备的社会、文化、精神、信息等价值的发挥^④。本研究引入文化依恋、角色认同和获益感知的概念,结合社会嵌入理论,挖掘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并探索其价值转换路径,对促进遗产保护、价值传承与社会发展等方面的有机融合具有积极意义。

三、研究假设与模型建构

(一)社会嵌入与文化依恋

文化依恋是个体与文化、文化群体之间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情感联结,表现为个体对文化的信赖感和归属感^⑤。嵌入性视角表明,社会关系为个人提供物质、社会和认知资源,从而塑造他们的决策和行为^⑥。对文化遗产地社区居民而言,其文化依恋来源于对当地文化资源的深刻理解,受到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的影响。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能有效增加社区成员间的互动和联系,最大限度地将社区居民凝聚起来,促使居民广泛参与到本地文化活动和实践中去。认知嵌入又称价值嵌入,强调文化遗产资源对当地居民经验、知识的影响^⑦,掌握相关知识的居民能进一步加深对本地文化的理解与认同,激发其参与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积极性。制度嵌入指个体行为受到管理规范和权力结构等的影响,制度对文化遗产的发展模式构建起着决定性作用,有效的遗产保护与传承离不开政策的引导和支持^⑧,制度的有效性不仅有助于文化遗产本身的保护和传承,也对提升居民的生活质量、经济福祉和文化自觉有着深远的影响。依据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1a:认知嵌入正向影响文化遗产旅游地社区居民的文化依恋;

H1b:制度嵌入正向影响文化遗产旅游地社区居民的文化依恋;

H1c:关系嵌入正向影响文化遗产旅游地社区居民的文化依恋;

H1d:结构嵌入正向影响文化遗产旅游地社区居民的文化依恋。

(二)文化依恋与角色认同、亲旅游行为

角色认同指个体的态度和行为与其对这个角色的诠释相一致,在环境的影响下不断被塑造和强化^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培养文化自觉和彰显文化自信的重要工具,通过其在社区中的保存、传承和展示,能够塑造和影响社区居民的认知、行为模式和社会交往方式。居民对文化的忠诚感与归属感

^① 杜政华、郝雨薇、姚旭:《社区居民对文化遗产的价值建构》,《改革与开放》2018年第20期。

^② Garau-Vadell J. B., Díaz-Armas, R., Gutierrez-Taño D., “Residents’ Perceptions of Tourism Impacts on Island Destina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 2014, 16(6), pp. 578-585.

^③ Tan S. K., Tan S. H., Kok Y. S., et al., “Sense of Place and Sustainability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The Case of George Town and Melaka”, *Tourism Management*, 2018, 67, pp. 376-387.

^④ 朱光亚、徐苏斌、杜晓帆等:《笔谈:求真·识史·互鉴——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多重价值的理论基础与方法路径》,《中国文化遗产》2023年第2期。

^⑤ Hong Y. Y., Fang Y., Yang Y., et al., “Cultural Attachment: A New Theory and Method to Understand Cross-cultural Competence”,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2013, 44(6), pp. 1024-1044.

^⑥ Dheer R. J., Lenartowicz T., “Career Decisions of Immigrants: Role of Identity and Social Embeddedness”,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Review*, 2018, 28(2), pp. 144-163.

^⑦ 王名、张雪:《双向嵌入: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自主性的一个分析框架》,《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⑧ 余凤龙、陆林:《制度对旅游发展影响研究综述与启示》,《旅游学刊》2008年第9期。

^⑨ 孙秀霞、孙谋轩、朱方伟等:《团队互动行为与项目角色认同:一项行动研究》,《南开管理评论》2021年第2期。

能够进一步强化居民的文化遗产权利和责任意识,是其认同的重要来源。已有研究证明,旅游地居民的地方依恋对旅游发展支持度有正向影响^①。同时,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的互惠原则,文化遗产旅游地存在不同形式的资源交换,在交换过程中,居民物质、社会或心理层面的获益,能够提升其对旅游发展的积极态度,从而产生亲旅游行为。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H2: 文化遗产旅游地社区居民的文化依恋正向影响其角色认同;

H3: 文化遗产旅游地社区居民的文化依恋正向影响其亲旅游行为。

(三) 角色认同与亲旅游行为

根据社会认同理论,个体对自身在特定社会群体中角色的认同程度会影响其行为方式^②。在个体层面上,认同是个体对自我身份的理性肯定及社会行为的持续动力;在社会层面上,认同是个体对社会资源的共同享有及社区共同体的内在维系动力^③。社区居民对自身角色的认同会影响他们对社区活动的参与程度^④。而文化遗产则可以激发居民对自身文化身份的自豪感和认同感,加强其对社区的情感联系。同时,已有研究表明,居民对自身角色的认知,能够影响其参与旅游开发的意愿^⑤。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H4: 文化遗产旅游地社区居民的角色认同正向影响其亲旅游行为。

(四) 文化依恋和角色认同的中介作用

计划行为理论认为,对某一行为的积极态度是激发个体行为意向的重要因素,且个体态度越积极,出现这种行为的意愿越强^⑥。文化依恋是人与地方不断互动形成的情感联结,反映了人们如何认同和依赖他们的周围环境。根据环境心理学和依恋理论,当居民对本地文化产生理解和依恋后,会激活自身自觉承担文化传承、保护与宣传的义务,进而产生积极的旅游开发支持行为。此外,依据“认知—情绪—行为”框架,个体对态度对象的认知、评价和情感能预测其行为反应^⑦。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5a: 文化遗产旅游地社区居民的文化依恋在认知嵌入与亲旅游行为间起中介作用;

H5b: 文化遗产旅游地社区居民的文化依恋在制度嵌入与亲旅游行为间起中介作用;

H5c: 文化遗产旅游地社区居民的文化依恋在关系嵌入与亲旅游行为间起中介作用;

H5d: 文化遗产旅游地社区居民的文化依恋在结构嵌入与亲旅游行为间起中介作用;

H6a: 文化遗产旅游地社区居民的文化依恋和角色认同在认知嵌入与亲旅游行为间起链式中介作用;

H6b: 文化遗产旅游地社区居民的文化依恋和角色认同在制度嵌入与亲旅游行为间起链式中介作用;

H6c: 文化遗产旅游地社区居民的文化依恋和角色认同在关系嵌入与亲旅游行为间起链式中介作用;

^① 郭安禧、王松茂、李海军等:《居民旅游影响感知对支持旅游开发影响机制研究——社区满意和社区认同的中介作用》,《旅游学刊》2020年第6期。

^② Obschonka M., Silbereisen R. K., Cantner U., et al., “Entrepreneurial Self-identity: Predictors and Effects within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Framework”,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Psychology*, 2015, 30, pp. 773-794.

^③ 王兆峰、黄曼丽:《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红色遗产地旅游者角色认同与实践研究》,《人文地理》2023年第4期。

^④ 井世洁、杨宜音、吴莹:《社区情绪:生成机制与治理策略》,《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23年第3期。

^⑤ 李录、徐珊珊、何景明:《文化记忆与乡村振兴: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社区参与——基于贵州省清镇市观游村索桥红军渡的个案研究》,《旅游科学》2022年第3期。

^⑥ 闫岩:《计划行为理论的产生、发展和评述》,《国际新闻界》2014年第7期。

^⑦ Hu X., Xi L., Esther Kou I., et al., “Macau Residents’ Attitude towards the Free Independent Travellers (FIT) Policy: An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ABC Model and Group Comparison”,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 2021, 26(9), pp. 935-952.

H6d:文化遗产旅游地社区居民的文化依恋和角色认同在结构嵌入与亲旅游行为间起链式中介作用。

(五)获益感知的调节作用

旅游开发带来的经济、社会、环境效益等均可以归纳为旅游获益,获益感知主要表现为居民所感知到的旅游活动带来的积极影响^①。研究证明,旅游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对价值共创有积极影响^②,居民感知到的积极影响会增加其对旅游发展的支持态度^③。因此,获益感知能够让居民充分认识到旅游发展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引导其参与到社区旅游发展中去,为文化遗产旅游地注入长久的发展动力。根据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7a:文化遗产旅游地社区居民的获益感知在文化依恋与角色认同间起正向调节作用;

H7b:文化遗产旅游地社区居民的获益感知在角色认同与亲旅游行为间起正向调节作用;

H7c:文化遗产旅游地社区居民的获益感知在文化依恋与亲旅游行为间起正向调节作用。

基于以上分析和逻辑推演,构建研究模型,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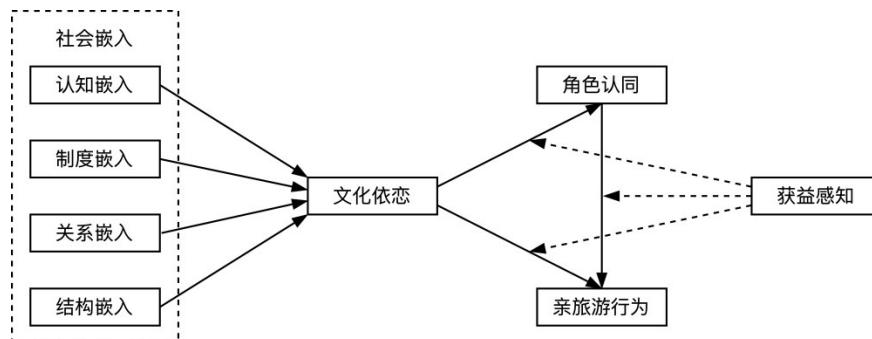


图1 研究模型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四、数据收集与分析

(一)案例地选择

澳门历史城区,是我国现存最古老、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最集中的中西特色建筑共存的历史城区,于2005年7月15日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澳门特区政府开始以此为契机发展文化遗产旅游,助力澳门经济的适度多元化发展。澳门历史城区内大部分建筑和遗迹仍是居民生活中的重要场所,在四百余年的历史中,中国人与葡萄牙人在此合力营造了不同的生活社区。2018年,澳门年接待游客数量达3580.4万人次,旅游收入达3735.7亿澳门元,文化遗产成为澳门的重要宣传名片^④。然而,旅游开发为澳门地区带来经济增长、基础设施改善等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导致了交通拥堵、环境质量下降、居民生活被干扰等消极影响,近年来社会上出现了向游客征收“旅游税”的声音。基于澳门历史城区旅游业发展现状及旅游开发对居民的影响情况,将其作为研究案例地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① 王纯阳、屈海林:《村落遗产地社区居民旅游发展态度的影响因素》,《地理学报》2014年第2期。

^② Lin Z., Chen Y., Filieri R., “Resident-tourist Value Co-creation: The Role of Residents’ Perceived Tourism Impacts and Life Satisfaction”, *Tourism Management*, 2017, 61, pp. 436-442.

^③ 刘静艳、李玲:《公平感知视角下居民支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以喀纳斯图瓦村落为例》,《旅游科学》2016年第4期。

^④ 黄梓卫:《澳门文化遗产“怀旧旅游”保护模式探讨——以澳门十月初五街为例》,《中国文化遗产》2021年第3期。

(二)问卷设计

问卷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研究模型主要变量的测量题项,第二部分为调查样本的人口统计学特征。为了衡量研究模型的准确性,量表题项均改编自现有成熟量表,并结合研究主题及实际需求进行调整和修改。测量题项均采用 Likert 7 级量表,1 表示“完全不同意”,7 表示“完全同意”。认知嵌入(CE)改编自俞林^①和谭芬等人^②,制度嵌入(IE)来自 Ju^③,关系嵌入(RE)改编自 Yin 等人的研究^④,结构嵌入(SE)来自 Park 等和 Laud 等的研究^{⑤⑥},文化依恋(CA)来自梁丽等和 Cheng 等的研究^{⑦⑧},角色认同(RI)来自武文杰等的研究^⑨,获益感知(PB)源于 Nunkoo 等和王咏等的研究^{⑩⑪},亲旅游行为(RTB)改编自 Ramkissoon 等的研究^⑫。

(三)数据收集

采用随机抽样法,采取线上问卷和线下发放纸质问卷相结合的方式,以澳门历史城区内社区居民为对象开展问卷调研。预调研环节,通过收集 75 份有效初始问卷,根据问卷数据和受众反馈情况,对问卷措辞和部分题项进行修正,以确保条目清晰准确,问卷的信、效度检验符合研究标准。正式调查总计回收问卷 465 份,剔除漏答、规律作答等不合格样本,最终获得有效问卷数量 402 份,问卷有效率为 86.45%,调查对象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如表 1 所示。

表 1 调查样本的人口统计学特征(N=402)

项目	类别	人数	占比(%)	项目	类别	人数	占比(%)
性别	男	187	46.52	职业	公务员	48	11.94
	女	215	53.48		企业员工	132	32.84
年龄	18—29 岁	142	35.32	居住时长	个体经营者	115	28.61
	30—45 岁	128	31.84		其他	107	26.61
	46—59 岁	87	21.64		5 年及以下	47	11.69
	60 岁及以上	45	11.19		6—10 年	42	10.45

① 俞林:《多重社会网络嵌入对虚拟品牌社区价值共创的作用机理》,《中国流通经济》2021年第12期。

② 谭芬、文高辉、胡贤辉:《基于社会嵌入视角的农户减施化肥意愿影响因素分析》,《中国环境管理》2021年第3期。

③ Ju Y., “Complexity Analysis about Formation Mechanism of Residents’ Value Co-creation Behavior in Tourism Communities: Based on the Social Embeddedness Perspective”, *Journal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Management*, 2022, 53, pp. 100-109.

④ Yin J., Shi S., “Social Interaction and the Formation of Residents’ Low-carbon Consumption Behaviors: An Embeddedness Perspective”, *Resources, Conservation and Recycling*, 2021, 164, No. 105116.

⑤ Park C. S., Kaye B. K., “The Tweet Goes on: Interconnection of Twitter Opinion Leadership, Network Size, and Civic Engagement”,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17, 69, pp. 174-180.

⑥ Laud G., Karpen I. O., “Value Co-creation Behaviour—Role of Embeddedness and Outcome Considerations”, *Journal of Service Theory and Practice*, 2017, 27(4), pp. 778-807.

⑦ 梁丽、杨伊生:《文化依恋问卷的编制及信效度检验》,《心理研究》2022年第3期。

⑧ Cheng Z., Chen X., “The Effect of Tourism Experience on Tourists’ 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Behavior at Cultural Heritage Sites: The Mediating Role of Cultural Attachment”, *Sustainability*, 2022, 14(1), p. 565.

⑨ 武文杰、孙业红、王英等:《农业文化遗产社区角色认同对旅游参与的影响研究——以浙江省青田县龙现村为例》,《地域研究与开发》2021年第1期。

⑩ Nunkoo R., Ramkissoon H., “Developing a Community Support Model for Tourism”,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11, 38(3), pp. 964-988.

⑪ 王咏、陆林:《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的社区旅游支持度模型及应用——以黄山风景区门户社区为例》,《地理学报》2014年第10期。

⑫ Ramkissoon H., Weiler B., Smith L. D. G., “Place Attachment and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ur in National Parks: The Development of Conceptual Framework”,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2012, 20(2), pp. 257-276.

续表 1

项目	类别	人数	占比(%)	项目	类别	人数	占比(%)
学历	初中及以下	23	5.72	居住时长	11—20年	95	23.63
	高中	51	12.69		21—30年	116	28.85
	专科	26	6.47		31年及以上	102	25.37
	本科	208	51.74	个人或家庭成员 从事旅游业	是	73	18.16
	硕士及以上	94	23.38		否	329	81.84

(四)共同方法偏差

采用问卷调查法收集数据会存在共同方法偏差,这种系统误差会影响假设检验的准确性。本研究采用Harman单因子评价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提取出第一个公因子的方差占总方差的比例为23.16%,未超过总方差解释量的一半^①。因此,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五)数据检验

在描述性统计的基础上,采用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PLS-SEM)进行数据分析与模型验证,借助Smart PLS 4.0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已有研究认为,PLS-SEM可以同时处理因果模型中的多个变量,适用于检验某一理论模型或模型假设的适切性与否^②。

1. 信效度分析。良好的信效度是衡量量表质量的重要指标。如表2所示,所有变量分项的因子载荷在0.797—0.913之间,Cronbach's α 系数在0.761—0.888之间,CR值在0.862—0.923之间,均符合相应的建议值^{③④}。各变量的AVE值均高于0.5,表明量表具有较好的收敛效度^⑤。如表3所示,各变量间AVE的平方根均大于该潜变量与其他潜变量间的相关系数,说明该量表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异质-单质HTMT检测结果如表4所示,所有构念之间HTMT值均小于0.85的标准,同样表明构念间具有良好的区别效度^⑥。

表2 信度与收敛效度检验结果

测量变量	测量题项	因子载荷	Cronbach's α	CR	AVE
认知嵌入 (CE)	我了解社区内的历史和文化	0.829	0.772	0.868	0.686
	我熟悉社区内的特色活动和传统	0.806			
	我能认识到社区文化遗产在日常生活的重要性	0.850			
制度嵌入 (IE)	社区内有很多政策法规支持文化传承与发展	0.830	0.759	0.862	0.675
	社区管理部门在促进文化发展中发挥很大作用	0.824			
	文化习俗和规范在处理社区事务中发挥很大作用	0.810			
关系嵌入 (RE)	我与社区居民关系紧密,一起参与文化活动	0.890	0.871	0.921	0.795
	我所在的社区成员对社区文化遗产感到满意	0.871			
	我期待与社区居民进行持续文化互动与交流	0.913			

① Podsakoff P. M., MacKenzie S. B., Lee J. Y., et al., "Common Method Biases in Behavioral Research: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and Recommended Remedie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03, 88(5), pp. 879-903.

② Petter S., Straub D., Rai A., "Specifying Formative Constructs in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 *MIS Quarterly*, 2007, 31(4), pp. 623-656.

③ Chin W. W., "The Partial Least Squares Approach to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Modern Methods for Business Research*, 1998, 295(2), pp. 295-336.

④ Cronbach L. J., "Coefficient Alpha and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Tests", *Psychometrika*, 1951, 16(3), pp. 297-334.

⑤ Fornell C., Larcker D. F., "Evaluat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with Unobservable Variables and Measurement Error",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1981, 18(1), pp. 39-50.

⑥ Henseler J., Ringle C. M., Sarstedt M., "A New Criterion for Assessing Discriminant Validity in Variance-base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Journal of the Academy of Marketing Science*, 2015, 43, pp. 115-135.

续表 2

测量变量	测量题项	因子载荷	Cronbach's α	CR	AVE
结构嵌入 (SE)	我在社区内拥有文化志趣相投的朋友	0.848	0.790	0.876	0.702
	我在社区内的文化社交圈大,关系融洽	0.862			
	我积极参与并促进社区文化活动的开展	0.803			
文化依恋 (CA)	我为本社区的历史和文化感到自豪	0.814	0.761	0.863	0.677
	我对社区的文化遗产有强烈的认同感	0.826			
	与其他地方相比,本社区的文化遗产是不可替代的	0.827			
角色认同 (RI)	我应当作为社区文化遗产的保护者	0.860	0.807	0.886	0.721
	我应当作为社区文化遗产的传承者	0.844			
	我应当作为社区文化遗产的传播者	0.844			
亲旅游行为 (PTB)	我很高兴看到有游客来社区游玩	0.826	0.841	0.893	0.677
	我愿意与来访游客进行交流	0.797			
	我支持社区增加旅游吸引物	0.818			
	我支持加大投资促进本社区旅游业发展	0.849			
获益感知 (BP)	旅游业增加了社区居民的就业机会	0.810	0.888	0.923	0.749
	旅游业改善了社区的基础设施	0.848			
	旅游业提高了社区居民的生活水平	0.902			
	旅游业为社区带来了更多投资机会	0.899			

表 3 区别效度检验结果

变量	CE	IE	RE	SE	CA	RI	PTB	PB
CE	0.828							
IE	0.356	0.821						
RE	0.271	0.279	0.891					
SE	0.341	0.279	0.172	0.838				
CA	0.395	0.402	0.400	0.365	0.822			
RI	0.321	0.253	0.167	0.258	0.332	0.849		
PTB	0.176	0.162	0.090	0.090	0.180	0.468	0.823	
PB	-0.132	-0.166	-0.207	-0.225	-0.539	0.088	0.574	0.866

注:斜对角线上加粗数值表示对应变量 AVE 的平方根。

表 4 HTMT 检验结果

变量	CE	IE	RE	SE	CA	RI	PTB	PB
CE								
IE	0.466							
RE	0.331	0.343						
SE	0.433	0.353	0.199					
CA	0.513	0.527	0.490	0.462				
RI	0.411	0.325	0.197	0.321	0.422			
PTB	0.222	0.205	0.105	0.117	0.225	0.568		
PB	0.157	0.197	0.236	0.267	0.652	0.102	0.660	

2. 路径关系检验。采用 Bootstrap 法进行路径分析和 t 值、p 值检验,结果如表 5 所示。认知嵌入、制度嵌入、关系嵌入、结构嵌入与文化依恋呈显著正相关($\beta=0.183, p<0.001$; $\beta=0.209, p<$

$0.001; \beta=0.258, p<0.001; \beta=0.200, p<0.001$), 假设 H1a~H1d 获得支持; 文化依恋与角色认同呈显著正相关($\beta=0.332, p<0.001$), 假设 H2 获得支持; 文化依恋与亲旅游行为不相关($\beta=0.027, p>0.05$), 假设 H3 没有获得支持; 角色认同与亲旅游行为呈显著正相关($\beta=0.463, p<0.001$), 假设 H4 获得支持。因此,除 H3 外,本研究模型的 6 条直接作用关系假设皆成立。

表 5 路径关系检验结果

假设	路径	路径系数(β)	t 值	p 值	是否成立
H1a	认知嵌入→文化依恋	0.183	3.836	0.000	是
H1b	制度嵌入→文化依恋	0.209	3.838	0.000	是
H1c	关系嵌入→文化依恋	0.258	5.595	0.000	是
H1d	结构嵌入→文化依恋	0.200	4.094	0.000	是
H2	文化依恋→角色认同	0.332	6.070	0.000	是
H3	文化依恋→亲旅游行为	0.027	0.595	0.552	否
H4	角色认同→亲旅游行为	0.463	7.581	0.000	是

3. 中介效应检验。利用 Bootstrap 法进一步检验中介效应,结果如表 6 所示。中介路径的 t 值显示,文化依恋在认知嵌入、制度嵌入、关系嵌入、结构嵌入与亲旅游行为之间未起到中介作用;而文化依恋与角色认同的中介效果在认知嵌入($t=2.816, p<0.05$)、制度嵌入($t=2.823, p<0.05$)、关系嵌入($t=3.357, p<0.05$)、结构嵌入($t=2.927, p<0.05$)与亲旅游行为之间均起到正向链式中介作用。同时,置信区间的结果也验证了以上结论。故假设 H5a~H5d 不成立,假设 H6a~H6d 成立。

表 6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假设	路径	间接效果	t 值	置信区间	p 值	是否成立
H5a	认知嵌入→文化依恋→亲旅游行为	0.005	0.556	[−0.011, 0.024]	0.578	否
H5b	制度嵌入→文化依恋→亲旅游行为	0.006	0.562	[−0.012, 0.027]	0.574	否
H5c	关系嵌入→文化依恋→亲旅游行为	0.007	0.58	[−0.015, 0.031]	0.562	否
H5d	结构嵌入→文化依恋→亲旅游行为	0.005	0.578	[−0.013, 0.024]	0.563	否
H6a	认知嵌入→文化依恋→角色认同→亲旅游行为	0.028	2.816	[0.011, 0.050]	0.005	是
H6b	制度嵌入→文化依恋→角色认同→亲旅游行为	0.032	2.823	[0.013, 0.057]	0.005	是
H6c	关系嵌入→文化依恋→角色认同→亲旅游行为	0.040	3.357	[0.021, 0.067]	0.001	是
H6d	结构嵌入→文化依恋→角色认同→亲旅游行为	0.031	2.927	[0.014, 0.055]	0.003	是

4. 调节效应检验。采用 Bootstrap 法进行调节效应分析,检验结果如表 7 所示。获益感知在文化依恋和角色认同间的调节作用不显著($\beta=0.081, p>0.05$);获益感知在文化依恋与亲旅游行为、角色认同与亲旅游行为间的调节作用是正向的($\beta=0.093, p<0.05; \beta=0.124, p<0.05$)。因此,假设 H7a 不成立,假设 H7b 和假设 H7c 成立。

表 7 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假设	路径	路径系数(β)	t 值	p 值	是否成立
H7a	获益感知×文化依恋→角色认同	0.081	1.535	0.125	否
H7b	获益感知×角色认同→亲旅游行为	0.093	2.030	0.042	是
H7c	获益感知×文化依恋→亲旅游行为	0.124	2.074	0.038	是

五、研究结论、启示与展望

1. 研究结论。第一,文化遗产旅游地社会嵌入对社区居民文化依恋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社会嵌入对社区居民的影响是多层面、多维度的,社会嵌入帮助社区居民与本地文化建立更为紧密的联系,提升居民对本地文化的依赖感和认同感。第二,文化遗产旅游地社区居民文化依恋对角色认同、角色认同对亲旅游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文化依恋对亲旅游行为的正向影响作用不显著。文化遗产旅游地社区居民的文化依恋可以帮助居民建立起更为积极和主动的社会角色,从而为社区发展作出积极贡献。然而,只有当居民对自身作为本地文化保护、传承与传播者的角色有明确的认知时,才能鼓励居民投入更多的精力和资源支持文化遗产旅游化,这也意味着文化依恋转化为亲旅游行为的过程具有复杂性。第三,文化依恋和角色认同是关键的中介因素,二者在社会嵌入与亲旅游行为间具有多重链式中介作用。具体而言,社会嵌入能促进居民对当地文化遗产作出积极的解读与诠释,进而增强其文化认同感,使人们在社会交换的过程中不断构筑身份认同,进而影响其对旅游开发的态度和参与度。第四,文化遗产旅游地社区居民的获益感知正向调节角色认同与亲旅游行为、文化依恋与亲旅游行为之间的关系,说明获益感知是增强社区居民亲旅游行为的重要因素。对于高获益感知的居民来说,文化依恋和角色认同对其亲旅游行为的影响会增强。然而,获益感知并不能显著调节文化依恋对角色认同的影响,表明除获益感知外,个体的成长环境、教育背景、个人经验等其他因素也可能会影响文化依恋与角色认同之间的关系。

2. 理论贡献。一方面,以往关于居民对旅游目的地开发支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主客互动、获益感知等层面,本研究则结合嵌入性理论,从社会网络关系角度,深入探讨了文化遗产旅游地社区居民亲旅游行为形成的社会心理机制,揭示了社会嵌入对文化依恋和角色认同的积极影响,扩展了嵌入性理论在旅游研究领域中的适用范围,为未来学者开展相关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另一方面,研究结论验证了获益感知在文化依恋与亲旅游行为、角色认同与亲旅游行为之间存在调节作用,强调了社区居民参与和居民获益在文化遗产旅游化发展中的重要性,为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与利用,以及社区资源的共商、共建、共享提供了有益的理论指导。

3. 管理启示。研究结论为文化遗产旅游地社区的管理和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实践启示。其一,研究强调了社会网络关系的重要性,文化遗产旅游地应注重社区参与和合作,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搭建群众文化生活交流平台,持续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其二,研究证明了社区文化环境对居民认同感与归属感的积极影响,社区应协调好本地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之间的关系,营造健康向上的社会文化环境,以高质量文化供给提升人们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其三,研究验证了当居民感知到的效益符合或高于自身期望时会进一步激发其亲旅游行为,因此旅游管理部门在制定政策时,应致力于居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完善旅游收益分配机制,帮助居民从旅游发展中获益,增强居民对社区发展旅游业的信心。

4. 研究局限与展望。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揭示了文化遗产旅游地社会嵌入与社区居民亲旅游行为之间的作用机制,但研究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以澳门历史城区为研究对象,然而不同文化遗产旅游地,因开发时间、资源利用、建设机制的不同,发展情况也不尽相同,因此未来可关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地区,以验证研究结论的普适性。其次,采取问卷调查法集中于某一时间段在特定区域进行调查,时间跨度不足,缺乏对案例地、调查对象进行持续观察,未来研究可进一步完善研究方法,如采用纵向数据,动态审视案例地的人地关系演化情况。此外,在研究文化遗产旅游地社会嵌入与社区居民亲旅游行为之间的关系中,主要聚焦文化依恋和角色认同的中介作用,一些其他因素也可能会影响受众的行为意愿,未来研究可引入其他变量,深入研究受众心理和行为机制的内在关联,为文化遗产旅游地社区可持续发展提供更为详尽和全面的指导。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Embeddedness on Pro-Tourism Behavior of Community Residents in Cultural Heritage Tourist Destinations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the Historic Center of Macau

Wang Zhong Li Laibin

(Faculty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ity University of Macau, Macau 999078, P.R.China)

Abstract: Community residents constitute an integral component of cultural heritage sites. Their pro-tourism conduct not only influences tourists' perceptions and experiences but is also a crucial precursor to the sustainable advancement of local tourism. The extant literature on residents' attitudes toward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heritage tourism is frequently constrained by an economic rationality perspective, with scant attention paid to the local socio-cultural environment. The social embeddedness theory posits that individual economic and social behaviors are situated within social networks and shaped by social relations. This provides a novel lens through which to examine the rationale behind residents' actions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in cultural heritage sites.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theory, the study introduces three variables—cultural attachment, role identity, and benefit perception—to construct a research model of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types of social embedding on the pro-tourism behaviors of community residents in cultural heritage tourism sites. In consideration of the case's typicality and suitability, the Historic Centre of Macau was selected as the case site, and local community residents were utilized as survey respondents. The hypotheses were tested using the partial least squares method based on 402 valid questionnaires.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social embeddedness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cultural attachment, which in turn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role identity. Role identity, in turn,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pro-tourism behaviors of community residents in cultural heritage tourism destinations. Cultural attachment and role identity function as chain mediators between social embeddedness and pro-tourism behaviors. Additionally, benefit perception exerts a positive moderating influence between cultural attachment and pro-tourism behaviors, as well as between role identity and pro-tourism behaviors. The study demonstrates that social embeddedness exerts a multifaceted and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formation of emotional and identity constructs among community residents in cultural heritage tourism settings. It encourages residents to perceive the local culture in a positive light, facilitates the formation of their identities through social interactions, and reinforces their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and commitment to safeguarding community cultural resources and supporting the moderniz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ommunity. The study demonstrates the influence of the community cultural environment and social network on residents' cognition and behaviors. Additionally, it substantiates the assertion that the prospect of benefiting from tourism development is a pivotal motivator for community residents to engage in supportive behaviors pertaining to tourism development. In conclusion, it can be stated that the residents of the community are the primary participants and beneficiari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in cultural heritage sites. It is essential to recognize the subjective role of community residents and to implement strategies that facilitate their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healthy and vibrant cultural environment. This will ensure that residents can benefit from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enhance their confidence in the growth of tourism in their community. This will facilitate the comprehensive integr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and tourism, as well as two-way empowerment. The findings contribute to the existing body of research on the pro-tourism behaviors of residents in tourist destinations, offering valuable insights for governments and managers of cultural heritage sites in the formulation of tourism development strategies. Furthermore, the findings have implications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heritage sites and the enhancement of residents' well-being.

Keywords: Cultural heritage tourism; Social embeddedness; Cultural attachment; Community involvement; Pro-tourism behavior

[责任编辑:丁培卫 郝云飞]